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Overseas Study on
Mo Yan's Works

海外莫言研究

宁明
编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Overseas Study

on Mo Yan's Works

海外莫言研究

宁明 编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莫言研究/宁明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9

(莫言研究书系/张华总主编)

ISBN 978-7-5607-4896-2

I. ①海… II. ①宁…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2419 号

责任策划:马 新

责任编辑:董付兰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0.75 印张 204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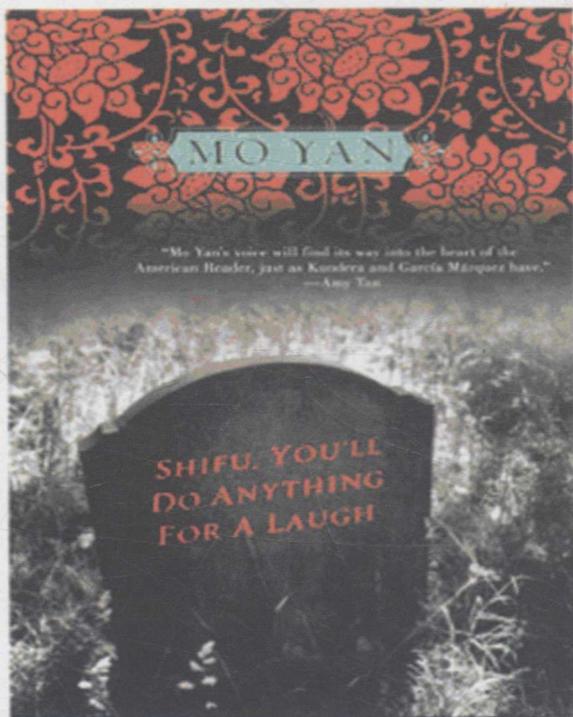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走向世界的莫言



2008年12月,本书作者与莫言合影



《蛙》日文版

本书系

“莫言与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研究成果”之一

《莫言研究书系》编委会

总 主 编 张 华

副总主编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编 委 张 华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齐林泉 孙书文 丛新强

兰传斌

《莫言研究书系》总序

◇张 华

我们谋划编辑出版《莫言研究书系》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86年，创刊《青年思想家》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杂志牵头，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全国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莫言成了《青年思想家》的栋梁作者，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青年思想家》里。2000年后，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导师……与莫言交往二十多年，可谓知根知底，友情笃厚，持续关注。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与意象、语言特色等都有广泛的探索，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幻境”，也是一个“中国的缩影”。他说：“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终生奋斗的目标。”（莫言《小说的气味》）因此，莫言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一股

“莫言热”正在持续升温。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解读、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特别是在研究者中，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方法、范畴和观点。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我们现在推出这套《莫言研究书系》。这个书系的作者群，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也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者，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给他们提供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

《莫言研究书系》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是一个开放的书系。首先推出的第一批书是：《莫言研究三十年》、《莫言弟子说莫言》、《乡亲好友说莫言》、《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海外莫言研究》、《莫言与世界》等六种。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系是个开放的书库，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

(张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原《青年思想家》杂志第一任社长)

海外莫言研究总论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其作品更是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在读者间掀起一阵“莫言热”。可是，在众声喧哗背后，仔细研究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和批评研究轨迹，分析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研究与接受的异同，才可更好地把握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家在世界文学视域中的定位，并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可参考的范例。本书主要参考海外有关莫言研究的文学批评文章，以及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海外各大媒体的报道和专家、学者的评论等，以期为文学研究者和关注者打开一扇了解世界文学视域下莫言文学研究之门。

一、莫言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

迄今，莫言的作品已经翻译成17种文字，包括全部长篇小说和部分中短篇小说。

翻译成英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五部，还有中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内含《师傅越来越幽默》、《人与兽》、《翱翔》、《灵药》、《爱情故事》、《沈园》、《弃婴》），短篇小说集《爆炸和其他的故事》。

翻译成法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十三步》、《四十一炮》、《檀香刑》和《生死疲劳》8部，中短篇小说集《筑路》和《透明的红萝卜》2部，短篇小说集《铁孩子》，还有短篇小说《爆炸》、《藏宝图》、《师傅越来越幽默》、《欢乐》和《怀抱鲜花的女人》5篇。

翻译成德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和《生死疲劳》4部，中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

翻译成日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和《生死疲劳》6部，中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和《幸福时光》2部，短篇小

说集《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和《白狗秋千架》2部。

翻译成意大利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6部，中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和《养猫的人》2部。

翻译成荷兰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4部，中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

翻译成韩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食草家族》和《生死疲劳》7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短篇小说《月光斩》。

翻译成越南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十三步》、《四十一炮》、《檀香刑》、《红树林》、《食草家族》和《生死疲劳》10部，短篇小说《牛》、《筑路》、《红蝗》、《欢乐》、《战友重逢》5篇，散文集《莫言散文集》。

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2部和中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

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和《蛙》5部。

翻译成瑞典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3部。

翻译成葡萄牙文的有：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2部。

翻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2部。

翻译成波兰文的有：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2部。

此外，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还被翻译成了挪威文，《天堂蒜薹之歌》被翻译成了希腊文，《丰乳肥臀》被翻译成了塞尔维亚文，《酒国》的俄文版也已经问世。

莫言的作品除了被翻译成以上各国文字之外，一些作品也在港台地区出版发行。在台湾出版的主要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怀抱鲜花的女人》、《梦境与杂种》、《丰乳肥臀》、《红耳朵》、《传奇莫言》、《会唱歌的墙》、《食草家族》、《檀香刑》、《白棉花》、《冰雪美人》、《红高粱的孩子》和《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等15部。^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莫言作品翻译较多的文字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越南语、日语、韩语，在西方翻译作品最多的语种是法语，在亚洲则是日语。其作品的传播轨迹呈现出以世界性语言为载体，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与中国文化关联密切的亚洲国家传播的规律。在西方的传播主要通过有影响力的翻译家的译介，并且存在外文间互相转译的情况。英文译者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他遵

^① 参见莫言：《恐惧与希望》，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375页。



循英美文学翻译的准则,从整体上把握作品,而非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传神地反映了莫言作品的韵味,又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和阅读习惯。法国翻译家杜特莱、尚德兰从事莫言作品的法文翻译工作多年,杜特莱夫妇更是到过莫言的故乡高密参观,了解其作品中的神秘“故乡”。日本的译者藤井省三在日本享有盛誉,吉田富夫感叹莫言作品中的故乡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故乡广岛的味道。越南的陈庭献也是熟悉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大师。

除了译者的功劳,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外交往和交流越来越多,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海外传播。莫言本人也很重视这一点。自1987年起,他曾应邀出席过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活动,并作过20余次演讲和重要发言。

随着莫言在海外的屡屡获奖,他在国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以亚洲为例,尽管莫言的作品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发行,但其关注度却不是很高。及至新世纪之后,对莫言的关注度才逐年上升,2012年诺奖公布之后,对其作品的关注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海外研究情况

海外对莫言作品的关注主要来自学术批评、书评、读者反馈和媒体声音。本书主要以学术批评和书评为主,关注其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的研究状况。

有关莫言作品海外研究的英文版学术批评文章有近40篇,主要来自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汉学家,以及学习中国文学或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等,发表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国际期刊或收录在相关著作中。有关文学期刊主要有《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国信息》、《中国文化》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中质疑的现代性》、《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抗的政治:中国当代实验小说》等。另有硕博论文数篇,如陈雪莉(Chan, Shelly W.)的《持续和间断:莫言的小说》、危令敦(Ngai, Ling Dun)的《性政治:张贤亮、莫言和王安忆的小说》、李佩然(Lee Vivian Pui Yin)的《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再现:韩少功、莫言和苏童》、方金彩的《中国男性作家小说中男性气概的缺失和父权制的重建:张贤亮、莫言和贾平凹》和范礼敦(Nathan C. Faries)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叙事》等。同时,美国的《当代世界文学》、《新国际主义者》、《出版家周刊》、《当代小说评论》等文学专业或非专业的杂志等都有大量关于莫言作品的书评,多是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并且作一些印象式点评,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同样,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越南语等的学术批评和

研究尽管在数量上和广度上不及英语,但也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

这些批评和研究主要从乡土与农民问题,现实与浪漫叙事,男性与女性问题,生物、幽灵及其他问题,中外文化碰撞问题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1. 乡土与农民问题

对于莫言笔下的“乡土”叙写,评论主要将其与端木蕻良作品中的人物、主题等进行对比,并探讨他与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承续关系等。另外,因为莫言作品描写的主要是乡村场景,农民问题研究也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

孔海立在《端木蕻良和莫言小说世界中的“乡土”精神》^①中说,端木蕻良和莫言都十分重视人与故乡之间无法切断的纽带。对端木和莫言而言,科尔沁草原和高密东北乡不仅充满着神秘的美,而且是人们的受难所,在这里,人们得到锻炼,获得力量,使他们能够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创造历史。王德威在《想象中的原乡:沈从文、宋泽莱、莫言和李永平》^②中指出,莫言的写作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明显地像沈从文,但是莫言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能把熟悉的故乡场景转变成奇妙的地方,并且在新领土上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体系——这是沈从文最先做到的。这两位作家都在叙述中将怀乡极致化:首先,他们的怀乡充满乌托邦般的幻象或者对于英雄辉煌过去的怀念;然后,他们关照现实,发现其中的问题;最后,揭示这一切实际都是幻想。在莫言的故乡写作中,最出名的就是《红高粱家族》。在他的笔下,红高粱乡村不再是山东最贫困的地方,而是充满了冒险精神、有异国风情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居民不再是嗜血的、农村的野蛮人,而是有强烈的情感和骑士般精神的人。

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莫言在他的乡土叙写中必须面对的就是农民问题。杜迈克在《20世纪80年代莫言小说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③中提到了莫言小说中的乡村梦魇。在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枯河》、《欢乐》中,他一直把农村描写为梦魇般的世界,他作品中的农民与“五四”时期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类似,都是没有能力掌控自己命运的不公正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其作品延续“五四”时期乡村描写传统的主题:农民无论何时想要在社会等级中向上攀爬,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失败。《枯河》中,小男孩小虎爬到了一棵大树的顶端,向村长的女儿证明他是多么勇敢。正当他想从树顶看一下以前从没有机会看到的女孩家气派的庭院时,树枝断了,他从树顶掉了下来,掉到女孩身上,将她砸死了。他在被母亲和哥哥谩骂又险些被父亲毒打致死后自杀了,他为这种想要向上攀爬的愿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以说,农民在很

① 孔海立:《端木蕻良和莫言小说世界中的“乡土”精神》,《中国信息》1997年第4期。

② 王德威:《想象中的原乡:沈从文、宋泽莱、莫言和李永平》,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美]杜迈克:《20世纪80年代莫言小说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大程度上还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落后、贫穷;但是,如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描写的一样,有些农民比他人有更多的平等权利。吴国坤在《批判现实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形态: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①指出莫言渴望看到“革命”的和“进步的”农民,这是对现实生活中农民面临的被社会边缘化和贫困问题等的一种虚构性的替代。

2. 现实与浪漫叙事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②一书中将叙事模式概分为三种维度: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莫言早在《红高粱家族》时期就在叙事模式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因此被归为“先锋作家”,之后的《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和新作《蛙》更是就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莫言的笔下,现实与虚幻(浪漫)交错在一起,作者不再是全能视角的掌控者,叙述者的可信与否需要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托马斯·英奇在《西方人眼中的莫言》^③中重点研究了莫言的三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他认为,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不同于其他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托尔斯泰气势宏大的《战争与和平》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浪漫的《飘》。莫言的小说不是按年代顺序来叙写的,而是忽前忽后,需要读者自己进行联系并根据合理的顺序来理解事件,甚至根本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叙事方法,打破了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事实真相终将为人所知的看法,引导着读者自己把所有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叙述的事实真相在于内心的真实,而非事件的真实。同时,他还认为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思想意识明确,是要求在农村进行全面改革的一种宣言。而在《酒国》中,读者对小说中哪些是现实存在、哪些是虚构无法肯定,因为莫言总是用一种逃避的态度把事实和虚构混杂在一起。《酒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寓言故事,不仅涉及中国人,而且指向更重大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如何看待真理和现实,又如何去定义想象和创造。

安德鲁·斯达克在《是记忆还是虚构?红高粱的叙述者》^④中指出,《红高粱》的叙述者讲述的故事不过是他自己创造的幻想罢了,尽管他对叙述施加了影响,可是讲述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过去的事情,破坏了事情本身的可信度。所以,《红高粱》中阐明的历史是个人历史,尽管也许可以将其看作对官方历史的一个有价值的注脚,却几乎没有真正的政治或民族意义。因此,作者认为应该把《红高粱》作为政治讽喻小说或者元小说来理解。小说揭示了英雄话语的空洞之处。同样,因为叙述者希望传达他所信服

① (香港)吴国坤:《批判现实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形态: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中国文学》1998年第1期。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美]托马斯·英奇:《西方人眼中的莫言》,《当代世界文学》2000年第3期。

④ [美]安德鲁·斯达克:《是记忆还是虚构?红高粱的叙述者》,《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2006年第2期。

的“种的退化”的观点，他力图建立一种独白式的话语体系，这是革命文学典型的叙事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如此。

3. 男性与女性问题

莫言小说从《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到《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完成了从“男性主导”到“女性掌控”的转变。可是，这种转变是否真的代表了女性地位的提升或者社会观念的转变呢？

朱玲在《勇敢的新世界？论〈红高粱家族〉中建构的“男性”和“女性”形象》^①中论述了作品中塑造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并且指出：“很明显，在创作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时，莫言力图扭转或者颠覆深深植根于中国官方文化传统中的好与坏的截然的二元对立。没有塑造一个拥有这些美德，比如忠于党、遵纪守法和热爱国家或者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莫言歌颂的是一个嗜血的土匪头子，他公然蔑视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并且通过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成为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物。同样，莫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叙述者的祖母，是一个不顾传统女性美德、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女性，这样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是会因其道德败坏而受到谴责的。”她认为莫言在《红高粱》中乌托邦式的国度里塑造了余占鳌这一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的儒家主义理想的破灭，但最后又安排故事中的人物死去，则表达了他对主流思想意识的屈服。

钟雪萍（音译）没有重点关注余占鳌，而是从“杂种高粱”这一男性形象入手，分析了新时期人们对“男子气概”的追寻，尽管由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追寻之路曲曲折折。《红高粱》中的叙述者自称“杂种高粱”并非简单地自我否定，而是从儒家的知耻入手，在与“纯种高粱”的对比和激励之下，充满自尊自爱地去追求男子气概。“杂种高粱”不断地自我抨击也是作者和叙述者对历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定位他这代人与过去先辈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寻找和重新定义他这代人身份的一种尝试。^②

陈雪莉指出，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创造了一个充满着男性力量和美的父亲的王国，性别等级观念明显。尽管作品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但可以说《红高粱家族》仍是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的一部小说。而在《丰乳肥臀》中，“母亲”这位丰乳肥臀的女性遮蔽了所有男性的光辉，也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了女性的世界。其他的女性也都是强有力的女性形象，而在中国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一向被认为可以驱动历史前进

^① 朱玲：《勇敢的新世界？论〈红高粱家族〉建构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吕彤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问题》，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钟雪萍：《杂种高粱和男性对男子气概的追寻》，《禁锢的男性气概？20世纪末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和男性主体的有关问题》，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49页。



的男性却成了作者嘲笑的对象。^①

4. 中外文化碰撞问题

自从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首次出现“高密东北乡”的概念以来,莫言笔下的“故乡”版图不断扩大,伴随着他的一部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延伸到现实的、虚幻的世界的各个角落。他的“高密东北乡”在评论中也一再被提及,被认为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有异曲同工之妙。

托马斯·英奇在《莫言与福克纳:影响和相似之处》^②中,分析了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大风》、《白狗秋千架》的艺术特色,并将其与此后的小说《枯河》、《断手》进行比较后,认为莫言阅读了福克纳的作品后,在创作上体现了福克纳的影响。但作者同时又对二人的生活环境与经历进行了比较,指出他们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从而也认同“在叙述技巧、结构、作品中对过去充满怀旧色彩的悲剧人物和叙述者虚构性地重塑家族史等方面可以看出福克纳的影响,但也许没有福克纳莫言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写作,因为他们生活经历类似,都生活在20世纪饱受政治和工业化影响的农村。不管是相似还是影响,对于莫言,正如对于其他的世界级作家一样,重要的是福克纳这样一个榜样,而并非直接采用他的主题或技巧”。

除了经常被提及的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红高粱》中的叙述者时,安德鲁·斯达克在《是记忆还是虚构?红高粱的叙述者》中指出,他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者一样,都需要有人相信他的故事是真实的。即使叙述者在自说自话,读者也可以选择作为听众参与其中。

另外,还有很多文章谈到莫言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杨小滨在《〈酒国〉:一种奢华的堕落》^③中提到,中国美食文化在小说中的展现也许可以追溯到《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包含大量描写宴会的场景,还无数次地提到过度饮食。这些描写可以与《酒国》中的“全驴宴”相比,《酒国》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三部小说所有的嬉戏场景并非展现在孤立的场景中,而是出现在各个层次上,作为集体堕落的前戏。同时,作者还谈到该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关系,认为二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反抗吃人的奋斗史。只不过,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成功地保护了师父免于被各路妖魔吃掉;可是,在《酒国》中,侦察员丁钩儿不仅未能阻止“吃人”,自己也落得个“吃人”的嫌疑和身败名裂的下场。葛

① 参见陈雪莉:《从男性王国到女儿国:论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当代世界文学》2000年第3期。

② [美]托马斯·英奇:《莫言与福克纳:影响和相似之处》,《中国文化与福克纳期刊》1990年第1期。

③ 杨小滨:《〈酒国〉:一种奢华的堕落》,《位置》1998年第1期。

浩文也在《莫言的“阴郁的”禁食》^①一文中指出，莫言的《酒国》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利用了吃人这一主题，但不同的是，《酒国》中没有发出对未来救赎的呼吁，也不是公开说教，可以看作对鲁迅早期作品的部分模仿。德国的汉学教授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在《莫言〈酒国〉中的享乐和权力》^②一文中指出，酒在这部小说中起的作用远非作为酒国城的地方特色与享乐工具，而是像阿Q思想一样，是在整个中国广泛流行的自我欺骗与自我麻痹的倾向，摧毁真相，让人们无法认识到真理与中国的真实状况，这都应受到指责。

5. 生物、幽灵及其他问题

莫言小说中经常以动物为喻体甚至直接将其作为主体，表现作品的主题和隐含的思想。《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六世轮回幻化成驴、牛、猪、狗、猴等，虽是动物之身，却有人的思维和感情，看着世事的纷扰变迁。小说《蛙》的题目更可以多解为“蛙”、“娃”或“娲”，含义丰富，引人深思。除了小说中的生物意象，幽灵鬼怪也经常作品中出没，也让人产生透过缥缈幻象看到真实一面的欲望。可以说，人的动物性和动物、幽灵的人性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亦真亦幻、真假难辨的世界。除了作品中存在的一些意象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跨界研究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张寅德在《生物的小说：莫言作品中的人和动物》^③中指出，在莫言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种普世的写作方式。他的作品模糊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体现了一种所有物种共存共生的观念。对人类残酷对待动物的控诉，对灵魂转生的同情，人兽转化的形象具化：这些都是以小说形式表现的生物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张寅德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生物政治学小说：刍议莫言小说〈蛙〉》中，提出了三条反思线索，循此可以对生物政治学展开一次审视和发现之旅。首先，小说尖锐地批判了国家强制力。强制流产昭示了生物学权力的政府行为，这种权力把生物学政治引向致亡的政治。与此相应的是极端自由的经济学，一个充斥着无数灾难和奢望的领域，诸如在代孕妈妈的外衣下进行的人体非法交易，在对人体的异化和商品化中破坏了人的尊严。最后，通过极为复杂的象征主义布局，小说宣布了人生的根本需求，不管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还是作为社区的一员，都要坚决抵制政治上的逼迫和道德上的堕落，恢复并捍卫他们的基本权利。生物伦理学的基座绝不是国民素质论者所谓的社群主义，

① [美]葛浩文：《莫言的“阴郁的”禁食》，《当代世界文学》2000年第3期。

② [德]韦荷雅：《莫言〈酒国〉中的享乐与权力》，彼得·朗格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5页。

③ 张寅德：《生物的小说：莫言作品中的人和动物》，《中国视角》2010年第3期。